

鼓浪学术书系·古典文学新视野



魏
文
学
嬗
变
研
究

胡
旭
著

厦 门 大 学 出 版 社

鼓浪学术书系 · 古典文学新视野

汉魏文学嬗变研究

胡旭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魏文学嬗变研究/胡旭著.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4. 8
(古典文学新视野丛书)

ISBN 7-5615-2261-4

I. 汉… II. 胡… III. 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汉代—
魏晋南北朝时代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93446 号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大学 邮编:361005)

<http://www.xmupress.com>

xmup@public.xm.fj.cn

福建沙县方圆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地址:沙县长安路金沙园区 邮编:365500)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75 插页:2

字数:260 千字 印数:1—2 000 册

定价:17.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总序

古人有言：“学术者，人才之本也。”（颜元《习斋记余》卷一《未坠集序》）时移世易，此理犹然。鲁迅先生执教厦大国学院，重树人而弘学术，愤“死海”而思激扬，情出肺腑，言若金石。学子感奋，不憚弄潮，遂以“鼓浪”、“波艇”名其刊物，欲竞雄于风涛。斯人已逝，风范犹存。

鼓浪者，激浊扬清之谓也。语言寓褒贬，文学重美刺，艺术尚讽谏，“学术无有大小，皆期于道”（章学诚《文史通义·与朱沧溟中翰论学书》），自古而然。时至今日，以道为教条则迂，以道为规律则活。昌明学术，始于实践；立言助教，贵在自得。鲁迅尝论治学于厦门，力非“虚有其名，不求实际”（《致许寿裳》），精警之言，足资启迪。

笃学精进，亦鼓浪之一义。王国维论古今东西之为学，谓不能出科学、史学、文学三者也。惟一国之民，性质有所偏，境遇有所限，故或长于此学而短于彼学；承学之子，资力有偏颇，岁月有涯；矣，遂而主此学而不从彼学。20世纪以还，文学与科学、史学交渗，碰撞诚难免，融合亦有缘。语言学卓然特立，贯通科、史、文而标领风骚。艺术学固自成一派，亦濡染风尚，关注声光电化，瞩目网际交流。信息如海，学术似潮。沧海无涯而人生有涯，惟不畏艰辛者能阅胜景；潮涨潮落而至理不移，惟潜泳渊深者可获骊珠。

书系设丛书若干，收录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近期学术成

果,陆续付梓。名以“鼓浪”,寄百舸争流之厚望,存继往开来之期许。语言与世推移,文学生生不息,艺术常见常新。先哲硕果,彪炳史册;见贤思齐,人之常情。有容乃大,育才斯馨。是为序。

《鼓浪学术书系》编委会

古典文学新视野丛书序

中国古典文学的悠久精深与厚重博大,犹如河海岱岳,是我们民族引以为自豪的。它所蕴含的精神财宝我们取之不尽,愈研弥新。因此尽管对它的研究已竭尽一代代学人的智慧与精力,取得了莫之与京的丰厚学术成果,但新的研究成果仍然随着日月而更新,以其颖异之特质,不断地增添着古典文学研究的新光彩。这套古典文学新视野丛书,即是这新光彩之一。

所谓新,表现在这套丛书中是多方面的。比如所研究的课题内容与角度之新,就是其中最显著的共同特色。如对隋唐运河与中晚唐社会、文化尤其是文学之间的关系的考察探赜,对宋南渡词人的文化版图的重组与文学命运的改变的论说,对中国古代宫廷戏剧史的描摹概述等研究,其所探究的领域乃是新辟的研究园地,属拓荒探险之举,故多所创获与发明。又如研究视野的多角度与综合观照考察,在丛书中也是较为明显的。如对汉魏文学演进嬗变的论述,对宋末词人群体的考察、对《西厢记》在明清时期的传播状况的梳理等,其论述既有点的深度,又有面的广泛,故能全面而深入。近些年较为流行的接受史新理论的运用,则体现在建安文学的传播与接受的研究上,故有新的见解与独特的阐释叙述。

中国古典文学从本质上讲既是文学的,又是历史的,它具有文史交融为一体的特质,属于文学的史学范畴。因此,对它的研究既要有文学研究的角度与方法,又要有史学研究的历史观照与手段。

因而具备史家意识,采用文史结合,以诗文证史、以史释诗文的方法进行探索研究,也就是其研究的应有之义了。这样的研究总让人感到具体、深入、厚实、可信。先贤的传统文学研究具有这种优良的方法和学风,而本丛书也具有这一风貌。作者们不尚浮词虚谈,力戒肤廓臆说,以史实为尚,以史实资料为依据,以达到探究本原、合理阐释之目的。这种务实的研究精神,在作者们采用文史结合方法的各项专题研究中都颇为明显,因而这种研究常常采用大量的历史的文学的文献典籍资料;常常是颇为具体务实的详尽考察探赜;常常将文学文化现象置于当时的具体社会政治背景、社会生活、社会风尚与具体的地域环境和历史遗存风物中进行历史的考察与阐释,从而力求还原其历史本来面貌。丛书中类此文史结合之研究多有体现,给人以鲜明的社会历史画面,它既是具体生动可触的,又是探微究奥,烛幽发秘,还历史以本真的实学研究。

这套丛书的作者都是厦门大学中文系从事古典文学教学与研究的教师,今将其部分研究成果集为丛书出版。厦门大学中文系具有悠久的历史,鲁迅、陈衍、施蛰存、林庚等著名古典文学大师曾在这里任教与著述。半个世纪前,周祖谟师从清华大学中文研究所毕业后到这里任教,不久即出版了国内第一部正式出版的断代文学史《隋唐五代文学史》。随后的一段时期,厦大古典文学的教学科研实力也颇为学界所瞩目。上世纪改革开放之初,出于周先生门下的弟子们遵从师训,继续沉潜于隋唐五代文学的研究,广取各家之长,探幽发秘,博考纵论,日积月累,多有创获,其中如林继中、贾晋华等遂成为当今在这一领域中颇有建树与声望的著名学者,为厦门大学的古典文学教学研究赢得了声誉。在这坚实的学术基础上,当今厦大古典文学教学与研究队伍又有了令人欣慰的新生机与新力量。其中尤其是本丛书的所有年轻作者都是近些年毕业于全国各所重点高校、出于名师门下的优秀学人。他(她)们具有扎实的古典文学与古典文献学功底,敏锐的学术洞察辨析力,

务实严谨、摒弃空言的优良学风,好学深思、勤勉于学的资质,这些均在其著作中有所体现。我欣喜地预见到这些年轻的学者们富有创造力的学术前景与成果,相信能不断努力,以屈子的坚韧不拔上下求索的精神与毅力去探骊得珠,为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再创辉煌。

我忝为一日之长,承乏作序,介绍此丛书,兼略及厦大古典文学研究队伍之简况。是为序。

甲申年仲秋吴在庆序于厦门大学海滨东区听涛斋

序

骆玉明

文学史的研究总是离不开一个分期的问题,有了适当的分期方法,也就画出了文学演变的主要轮廓。但凡事都有利弊。分期惯常是从各个历史阶段的差别来着眼的,特别是在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开始时,人们自然而然会强调它的新异之处,以便划出它和前一历史阶段的界线。然而历史本身却是一条连绵不断的河流,并不像登楼那样,一层一层分割得很清楚。所以对文学史分期的描述,往往看起来是那么回事,细细推究却常常会发现不少人为的痕迹。譬如讲到唐代诗歌,人们总喜欢首先提到王绩,特别是他那首《东皋野望》,认为它代表了不同于南朝绮艳诗风的新诗风的兴起。其实,这种较为质朴的诗作在南朝并非没有过,在王绩所生活的隋唐之际又并非主流,只是当人们需要描述从南朝到唐代诗歌变化之大势时,它成了恰好的标志。文学史上的汉代与魏晋,也被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特别是因为建安时代被认为是“文学的自觉时代”,人们就更为重视其开创性的特征。它和以前文学发展过程的联系不能说完全被忽视了,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显然是很不充分的。考虑到这种缺陷的存在,三年前我和胡旭君商量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时,我们一致认为从东汉后期到建安文学的连续性发展

过程^①,是值得研究的一个专题。现在呈献给大家的这部《汉魏文学嬗变研究》,就是他辛勤劳作的成果。

胡旭将他的整个研究工作围绕“文学自觉”这一核心问题来展开。最初,日本学者铃木虎雄在其1925年出版的《中国诗论史》一书中提出中国文学于建安时代进入自觉阶段的观点,1927年鲁迅在其著名的讲演《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也指出“曹丕的一个朝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鲁迅是否受到铃木氏的影响不是很清楚,但无疑正是由于他在中国现代学术文化中的特殊地位,这一观点才受到普遍的重视。近年来对这一问题又有新的讨论,一些学者针对上述观点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胡旭此书对“文学自觉”问题的见解,则是在鲁迅和铃木虎雄观点的基础上加以较大幅度的修正,他认为中国文学的自觉肇始于东汉中后期,到了建安时代进一步发展成熟。他的见解能否为大家所接受还是未定之数,但至少,我们在这书里可以看到他有自己清晰的理论立场和系统的论证;他从这一独特的见解出发来分析汉魏文学的嬗变,脉络也理得更为清楚。

书中从政治、思想、世风这三个各有偏重而又相关联的视角来探讨从东汉后期到建安时期文学嬗变的成因和表现。这里涉及的有些问题前人已经做过单独的研究,但是,当胡旭把众多社会与文化现象结合在一起考察时,还是有不少新的发现。譬如他谈汉灵帝的身世、个性与文艺趣味,灵帝所置“鸿都门学”的性质与特点以及它对传统学术的冲击,“鸿都门学”与曹氏家风的关系,就颇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从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重视娱情悦性、不以俚俗为嫌的艺术爱好怎样在东汉末越来越流行。还有,上述三个方面都属于宏观性质的考察,若依美国学者韦勒克《文学理论》

^① 从朝代的意义上说,“建安”当然仍是东汉的年号,但在文学史上,人们久已习惯将其视为魏晋文学的开头。

一书的分判,又都属于文学的“外部研究”,做得不好,很容易流于浮廓。现在这部书虽不能说完全没有铺述一般史实的毛病,但作者还是尽力把宏大的历史背景与具体的文学现象密切地结合起来,在充分把握资料的基础上提出具有个人心得的阐释。譬如在论述经学式微与文学嬗变的关系时,他通过排比《后汉书》人物传记中所提及的传主的著述情况,指出这样一个事实:从东汉前期到东汉中后期,文人的著述类型逐渐向文学性较强的方向偏转,认为“从东汉文体发展过程来看,存在着一个明显的文学化进程”。我觉得这是一个根据可靠的见解,不仅在汉魏文学嬗变的研究方面有重要意义,对中国文体史的研究也具有启发性。当然,胡旭的研究结果究竟得失如何,读者会有自己的评判,无须我在此过多饶舌,上面只是举两个例子对此书的特点作些简要说明。

《汉魏文学的嬗变》是胡旭的博士论文,也是他的第一部公开出版的学术著作。要说这书在学术上已经足够成熟,恐怕也是过誉。尽管由于论题涉及的范围过于宏大,需要处理的资料十分复杂,客观上造成了许多困难,我还是觉得在对史料进行精深的辨析和精确地把握评判尺度方面,尚需作出更大的努力。以前读裘锡圭先生的论文,看到他从出土断简上一些零碎的残文令人信服地考释出我们过去所不知道的汉代俗文学的情况,那种深厚的文史涵养与精深的辨析功夫的完美结合,真是令人惊叹。不过,我想胡旭的书就这样问世,也有它的必要和价值。因为书中就文学史研究的某些重要问题提出了若干新的看法,也做到了“言之有据,持之有故”,相信会引起人们的兴趣,对于推进有关研究的深入发展是有作用的。胡旭君为人诚恳,读书用功,将来在学术上取得更大成功之后,此书的问世,也是回首往事时一个值得纪念的标志吧。我为之写这些话作为序,且表庆贺与勉励之意。

目 录

总序

古典文学新视野丛书序

序

1

导 言:文学自觉的肇始与形成

13

第一章 政治变迁与文学嬗变

13

第一节 汉魏政治的变迁

24

第二节 政治变迁与文人的思想、生活

35

第三节 文学题材、格局及风格的变化

44

第四节 反映世积乱离和英雄意识的文学主题

53

第五节 建安风骨的失落与复归

67

第二章 思想变迁与文学嬗变(上)

67

第一节 儒学思想权威的渐趋式微

77

第二节 学术斗争与经学没落

90

第三节 文体观念发展显示的文学化进程

96

第四节 诗性精神的复归

104

第五节 辞赋与儒学思想的背离

113

第六节 散文的新变及其文学化进程的不均衡性

121	第三章 思想变迁与文学嬗变(下)
121	第一节 道家思想与隐逸之风
132	第二节 养生、方术、神仙与汉魏社会生活
154	第三节 隐逸文学的长足发展
164	第四节 养生与适性的文学主题
175	第五节 游仙文学领域的拓展
189	第四章 世风变迁与文学嬗变(上)
189	第一节 人物品藻与尚美之风
201	第二节 士人心态的变化与感伤思潮的流行
220	第三节 文学审美趣味的新变
234	第四节 文学对世风衰败的批判
243	第五节 文学中的悲情主题
252	第五章 世风变迁与文学嬗变(下)
252	第一节 鸿都门学
263	第二节 曹氏家风
280	第三节 文人地位的提高和文学观念的变化
288	第四节 文学的性灵化倾向
296	第五节 俗文学的崛起
311	第六节 建安文风中的别一支
318	参考文献
326	后 记

导 言：文学自觉的肇始与形成

鲁迅先生在 1927 年提出，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① 日本学者铃木虎雄先生也曾提出过类似观点。^② 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在随后的 60 余年中，这个论断似乎没有受到太多的质疑。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关于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文学的自觉时代”始于何时的问题，得到不少学者的关注，甚至一度出现了论争比较激烈的情形。概略言之，大体上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以张少康和詹福瑞二先生为代表，认为中国文学的自觉，早在汉代就开始了。^③ 张少康先生甚至认为中国文学自觉从战国后期的《楚辞》创作开始初露端倪，到西汉中期已经非常明确了。第二种观点认为文学自觉发生在魏晋之后的六朝时期，以尚定和刘跃进二先生为代表。尚定先生认为文学自觉是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六朝时期——发生并完成的。刘跃进先生则认为文学自

① 鲁迅：《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3 卷第 501 页。

② [日]铃木虎雄著，许总译：《中国诗论史》，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37～38 页。

③ 张少康：《论文学的独立和自觉非自魏晋始》，《北京大学学报》1996 年第 2 期。詹福瑞：《文士、经生的文士化与文学的自觉》，《从汉代人屈原的批评看汉代文学的自觉》，均见《汉魏六朝文学论集》，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觉是在南朝宋齐时期完成的。^①第三种观点是维护鲁迅和铃木虎雄的说法,依然坚持“魏晋说”,以李文初先生为典型代表。^②此外,还有一些就鲁迅、铃木虎雄乃至其他学者关于“文学自觉”的提法进行再探讨、再审视的文章,其中不无修正意识。^③同一个“文学自觉”的命题,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众说纷纭的解说呢?个中原因可能很多,但最主要的,可能还是在“文学自觉”的概念界定上标准不一。

究竟什么样的文学算得上“自觉的文学”呢?我们认为,自觉的文学应该是独立于政教之外(当然,它不可能跟政教没有联系)的艺术地表现人和人生的文学。我国现代文学理论界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曾提出过“文学是人学”的命题,引起过热烈的讨论。半个世纪以来,这一命题得到深化和趋同。只要不把这个“人”理解为哲学上或政治学意义上的抽象的人,而理解为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具体的人,这个命题是能正确反映文学本质的。当然,文学所艺术地认识和表现的人,除了人的外部活动外,还包括人的命运、人的心灵和人的个性,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④因此,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或者自觉的文学应该是艺术地表现人和人生的文学。用这样的观点来看汉代的大赋,何曾见到一个人影!枚乘《七发》中的太子和吴客,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中的子虚、

① 尚定:《走向盛唐》附录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6~283页。
刘跃进:《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导论部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26页。

② 李文初:《从人的觉醒到“文学的自觉”——论“文学的自觉”始于魏晋》、《再论我国“文学的自觉时代”——“宋齐说”质疑》、《三论我国“文学的自觉时代”》,均见《汉魏六朝文学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③ 孙明君:《建安时代“文的自觉”说再审视》,《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
徐国荣:《中国文学自觉的契机及其代价》,《学术研究》2002年第4期。

④ 包忠文:《艺术和人生》,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乌有、亡是公等大赋中的代表人物,都是虚拟的。大赋作家设计他们,只是让他们做一个传声筒,讲出一番山川、物产、歌舞、畋猎的话语来,并不是真正的文学意义上的人。因此,大赋只能算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而不能算得上“自觉的文学”。

“自觉的文学”理应来源于创作主体的自觉,即“人的自觉”,这一点在大赋文学的创作动机中显然是看不见的。日本学者兴膳宏先生说过:

汉代文人在宫廷中的地位很低,有类倡优。对于文学作品唯一绝对的读者和庇护者——君主,文人不得不竭力侍奉,根本无法提出维护文学作品独特尊严的主张。正因为如此,后来的扬雄才省悟作赋只是“雕虫篆刻”而折笔,并著《解嘲》,对自己具备良好的教养和高深的学问却甘居下流的事实作冷嘲式的说明。应该说,对绝对权威者的隶从是决不可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的。^①

兴膳宏先生是着眼于文学批评而发出的议论,他的论据完全适应于两汉大赋的创作现实,因而我们也完全可以这样再加上一句:对绝对权威者的隶从,是决不可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的。没有创作主体的自觉,就根本谈不上文学本身的自觉。东汉后期的大一统思想和政治的双重式微,使文人在长期的禁锢和压抑后,目光逐渐内敛,并因此而真正发现了自我,实现了文学自觉的重要前提——人的自觉。

真正“文学意义上的人”,存在于东汉以来的抒情小赋和诗歌中。当然,此期的抒情小赋和诗歌中,也找不到现代文学中的“人物形象”,只有抒情主人公。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文学重表现,不同

① [日]兴膳宏著,彭恩华译:《〈诗品〉解題》,《六朝文学论稿》,岳麓书社1986年版。

于西方文学的重再现,因而,我们更应该从抒“情”和写“意”的角度来理解古代文学对人和人生的表现。

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自觉地表现人和人生的文学有哪些内涵呢?我们认为主要是人的觉醒,即人的个体意识的出现。章培恒先生说过:“人的自我意识加强,是最引人瞩目的,这表现为:在一定程度上对个人价值的新的认识和对违背传统道德观念的个人欲望的肯定。”“由于自我意识的加强,文学的社会责任感减弱了。文学的创作首先不是满足社会的需要——政治、教化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自己,获得心灵上的快感。”^①章培恒先生所说的这种文学上的变化,是特指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我们则以为这种变化在东汉汉中后期的文学创作中已经出现。

这种变化的标志之一是张衡的《归田赋》的出现。张衡曾用十年时间,精思附会,写成《二京赋》。该赋的主旨是讽谏帝王公侯节俭,但可悲的是,这篇让张衡花费巨大精力所作的大赋,于政教却丝毫不补。面对着朝政日非、江河日下的局面,他的修齐治平的思想破灭了,道家思想开始抬头。《归田赋》中描写了隐居生活的恬淡情趣,景物清新和美,生活自由逍遥,诗人借此“娱情”、“纵心”。赋中虽然尚未显示鲜明的个性,但分明已有一个抒情主人公在,自我意识加强了,个人价值得到了关注。此后,抒情小赋不断出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蔚成大国,取代了大赋的地位。从此,辞赋成了文人抒情写意的工具,实现了文学的自觉。应该说,张衡的《归田赋》是文学自觉方面的一枝报春花。

这种变化的标志之二是“古诗十九首”的出现。东汉初,文人们受乐府民歌的影响,开始写作五言诗,到了东汉中后期,文人五言诗逐渐成熟了。大约在桓、灵之世,出现了一批文人五言诗(今已失去主名),其代表就是选录于《昭明文选》的“古诗十九首”。我

^① 章培恒:《关于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评价》,《复旦学报》1987年第1期。